

从太湖秋操到与中山先生的几次会面

华士龙^①

在安庆武备学堂

我在一九〇二年考入清政府设在安庆的安徽武备练军学堂。该学堂总办是冯煦^②，实际主管校务的是提调谭亦张^③。学堂规定，学业速成(定期一年毕业)，训练严格而紧凑。

来此学堂就学的青年同学都是汉人。当时，“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思想意识非常严重，社会风气又是鄙视这样的所谓“洋学堂”，因此，同学大都家境贫寒。但所有同学都有一些文化知识，又抱着习武图强的志向，故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思想容易在同学中间传播。几个年长的同学，如陈王谟(后改名血岑，武昌起义时是武汉的宪兵司令)、柏文蔚(字烈武，安徽人)、冷通(字御秋，镇江人)和我等，经常在一起议论时政，嬉笑怒骂。学

① 华士龙，又名彦云，江苏无锡严埭人，生于一八八一年。曾任清军第九镇三十三标第三营前队事务长、排长、队官。辛亥革命时，任江浙联军江北支队参谋长、第二军参谋长兼第十一师师长。辛亥革命后，任湘粤桂联军参谋、全国特种营业稽征特派员等职。于一九七九年逝世。作者在三十年代曾写有《余生散记》一文，在抗战时散失。此文为作者在九十七岁时，由家属根据上文断断续续笔录整理而成。

② 冯煦，字梦花，江苏金坛人。清科举中过探花。

③ 谭亦张，字学衡，广东人。清海军学堂毕业生，曾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后任清政府海军副大臣。

堂里的教官，也都是汉人，他们眼看清政府颓废腐败，大多同情学生的举动。一次，陈王谟拿来几本邹容撰的《革命军》，在同学中间传观，看过这本书的同学莫不痛恨清政府。在一个出操后的下午，正好许多学生聚在一起，又议论起这本书来。此事被提调知道后，他下令将邹容写的书全数搜去，又逼令陈王谟立即离去并令以后不准再来安庆。谭亦张又召集全体同学严厉训戒，说这类是禁书，以后不准再看。次日，便挂出了“陈王谟犯规开斥”的牌子。其实，我们这些同学，那时在学堂里起哄，都是自发的，没有参加过任何革命组织。

一年光阴易过，全体学生毕业。柏文蔚、冷遁先后到南京第九镇三十三标当过管带、标统。我仍留在安徽，派在驻菱湖嘴新军第三营做实习官。新三营的管带便是老师（武备练军学堂的教官）顾忠深^①。不久，顾忠深又去南京做第九镇三十三标教官。

一九〇四年，恩铭任安徽巡抚，委徐锡麟做巡警道。徐锡麟一到任就办了督练公所。我当时还是实习官，规定要到督练公所受训（受训的人都发俸银十二两，膳宿自理）。督练公所的督练官薛哲，见我考试内外场成绩都是“优等”，又见我有些民主革命思想，平时生活俭朴，说我“品性最好”。薛哲还带我和几个一同受训的实习官去见徐锡麟。徐锡麟嘉奖说：“你们品学兼优，本道对你们寄有厚望啊！”

一九〇五年，得到顾忠深来信，要我伴送他的家属去南京，我便向薛哲请假，薛哲和教官们都不忍放我离去，我说：“各位老师

^① 顾忠深，字尽忱，无锡人。抗战时，顾是汪伪南京政府监察院副院长，死于一九四五年。报上、书上登他的名字为顾忠琛，实为一人。顾弟名忠潏，“潏”字亦为水旁。我未听说顾曾将“深”改为“琛”。

栽培我的恩德永远忘不了，我也不忍就此离开各位老师，只是我受顾老师的嘱托，不得不护送师母去一次，我到了南京立即回来便了。”这样，我就伴送顾妻到了南京。本想过二、三天仍回安庆去，谁知一到南京，见到顾忠深，他便说：“你的差事已经派定了，你就在这里做事吧。”我说：“我可要失信于薛老师了。”顾忠深笑道：“你还在受训，几时委差亦不知道，那边又不是少不了你一个人，南京和安庆做事不也是一样？这里已经委差了，你就委屈一点吧。”我只得同意。想写一信辞谢薛哲，又觉得很难措词，一直犹豫着没有写。当下我便做了第三十三标第三营前队事务长。一九〇六年，又接何遂^①的缺，升做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杨韵轲^②属下的一排长。不多日，见报上登载徐锡麟刺死恩铭后自己牺牲，薛哲被捕斩首的消息。此事牵连甚广，恩铭手下人（属端方一派的）搜捕督练公所，杀害了我在督练公所的许多同学（凡我认识的同学竟无一幸免）。这个消息传到三十三标，我的许多同学和同事都感到悲愤。当我确知薛哲惨死的消息后，更是悲伤，想不到督练公所一别，竟成永诀。恩铭死后，冯煦接任安徽巡抚。冯煦信任顾忠深，招顾忠深去安徽当了新军混成旅旅长。

参加太湖秋操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这时我已升做队官），清廷举行

^① 何遂此时由第九镇保送北京陆军大学读书，后来改名何绪基，任第一镇的参谋长。

^② 杨韵轲，福建侯官人。第九镇响应武昌起义，攻雨花台失败后，杨率部到镇江与三十五标、三十六标会合，便在镇督林述庆部下做团长。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时，杨率部攻打天堡城。守天堡城的张勋部在城上将白旗乱摇，杨冲到城下高呼“缴械”，敌兵乱枪齐下，杨当场牺牲。

太湖秋操，安排南京第九镇与湖北第八镇进行对抗演习。为此，清廷特从安庆经潜山、太湖至湖北省建造一条军用公路，逢山开路，遇水造桥，以便行军和驶运辎重、炮车，规模颇大。第九镇规定先用轮船运往安庆登陆，然后步行至太湖与第八镇对阵。当运送我们的船队驶近安庆时，早见岸上人山人海，码头上的人都是来欢迎和看热闹的。那时，我国还没有飞机、坦克等武器，第九镇已有步、骑、炮、工、辎及卫生、汽球、电讯队等，在我国陆军中堪称完备了。当我们上岸整队，军乐开道，全军行进时，看热闹的人都欢呼起来。前来欢迎我们的，大都是安徽混成旅的军官，有顾忠深和我的许多同学在内。顾忠深和同学们特地为我们参加这次秋操的同学设席欢宴。我们这些从未打过仗的军官，都为能参加这次实战演习感到异常高兴。在安庆稍停了几天，便起队到太湖县。第八镇则自武汉经黄州而来，其兵员配备大致与第九镇相仿。

演习开始规定：（1）演习所用枪弹、炮弹都应只是空响弹，不准有弹头；（2）炮兵距“敌”三十步内不准开炮，步兵距“敌”十步内不准放枪；（3）故违伤人者，有司论罪。布置就绪后，演习正式开始。

最初，两军以遭遇战的形势出现。第九镇向前推进，大队之前有营级前卫探导，营前卫又分尖兵、排前卫、队前卫。营前卫与尖兵、排、队之间各相距二百至五百米，总距二千米左右（正是当时步枪的有效射程）。左有左卫左斥候，右有右卫右斥候，各距大队一千五百米左右，断后也有后卫卫护。

秋操在太湖县附近方圆几十里的丘陵地带进退拉锯，已“战”了三天，每天“战”况都十分激烈，且愈“战”愈猛，整个战场上杀声震天，硝烟弥漫，两军对垒，各显神通，变幻无穷。至夜晚则

自守休整筹划。

具体的战术审核，如攻占“敌方”山头、迂回穿插、侦察“敌情”、后队支援、后勤辎重供应、步骑或步骑炮合作推进、战地救护、汽球监视等等，都由陆军部来人过目亲询。我所部为机枪队，就有陆军部来人多方出题，进行考试。此次秋操筹备多时，清廷特邀各国军界要员和驻华使馆武官来实地参观。但由于缺乏经验，曾闹出笑话。我亲眼目见的汽球队协助炮兵侦察目标一事就是一例。汽球队系由日本人装备，在中国军史上，太湖秋操还是首次使用。日本技术教官多次试验都不得升腾，时“战”况正烈，炮兵标统王遇甲^①急不可耐，随手用马棒乱打日人，日人滚地嗷叫，无奈，只得忍气吞声，勉力将汽球升空了事。此次秋操虽有不少错误、失策，暴露了计划不周、经验缺乏的短处，但这样的盛况，在我国军事史上还是少见的。

熊成基起义 第九镇被疑

我记得，那天管带传下命令说：“统制徐令：各国来宾称赞，诸位大人嘉许，将士宜各用命，毋忽。”官兵更是振奋踊跃，斗志旺盛。演练正在紧张进行，突然接到北京急电：“皇上、皇太后晏驾。”两镇军队只得停止操演，举行哀礼。举哀仪式是步兵列队，倒握枪枝（将枪口向地，枪柄朝天），乐队吹奏哀号，统制徐绍桢嚎啕大哭，官兵议论纷纷，都为光绪和慈禧同时死去感到奇怪。

数日之内，军中又接急电，说：“安徽混成旅炮兵营队官熊成基兵变，营长陈昌镛殉职，熊成基败逃。”后来得知，该次兵变实

^① 王遇甲即火烧汉阳三祸首之一。

由顾忠深(该旅旅长)暗助,但由于起义军人寡势弱,目的不明,又有叛徒告发,遭到清王朝镇压,终告失败。响应者大部被捕,有四人被斩首示众,顾忠深亦受株连,与被斩四人一同绑赴刑场,正准备开斩,恰安徽抚台冯煦闻讯赶到,大呼“刀下留人”,才停止行刑。冯直奔端方住处,辩论是非曲直,为顾忠深百般洗刷,端方词穷无奈,交由臬台按察使朴梓桐亲审。顾忠深矢口否认与起义有关,朴梓桐又无充分佐证,只得以“用人不当”之罪,判处顾忠深“发配张家口军台效力”^①。我又有许多同学,在熊成基起义中牺牲了。后顾忠深告诉我,他受熊成基兵变牵连,和他一起被捕的有五个人,四个人被端方杀害。

熊成基起义失败后,清廷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以为第九镇也会揭竿而起。清廷对第九镇疑虑的根据在于:第九镇特别是我们三十三标的军官,大都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士兵又都是征来的新兵(不是招募的),他们思念故土,痛恨满人,所以三十三标是出了名的“革命军”。两江总督端方此次正亲自观操,当他得到熊成基兵变消息后,风闻下属亦将起事响应,即惊慌逃走。其实,第九镇官兵对于熊成基起义,事先毫无所知。端方走后,立即调动湖北第八镇围住第九镇大营,以作监视,更逼令我们三十三标到长江边扎营,又派来四艘军舰巡查附近江面,将舰上炮口对准我们。第九镇官兵遭到这样的境遇,无不义愤填膺,三十三标的官兵,更是睚眦欲裂,都将子弹顶上了膛。此时形势,兵变一触即发。头脑冷静的同学鉴于双方力量悬殊,知道冒险行动必然招致无谓的牺牲。最后,议定警戒应变。有一位同学写了一首诗:“鱼肉受刀俎,人在荆棘中。前后方十日,悲欢大不同。”

^① 即充军。

后来，端方没有采取进一步的紧逼行动，事态便也没有发展下去。

第九镇行动获得自由后，端方又玩弄起权术来了，他既想笼络人心，又想为秋操摆弄一番，于是宴招了第九镇全体军官。宴席上，每人拿到了一只江西官窑定制的酒杯，名为秋操纪念杯。杯呈椭圆形，上有粉红色牡丹花图案，取义为“一片丹心”。端方还以私人名义赠物，他赠我两把折扇，一把扇上有他自己作的诗，诗云：“漏声透入碧窗纱，人静秋千映半斜，沉麝不烧金鸭炉，淡烟笼月照梨花。”还有一扇，上面有达摩祖师坐在蒲团上，大概出自当时某名家之手。也有一诗，诗是苏州知府张船山所作，诗云：“西来谁信渡江难，波浪萧萧一苇寒，面壁十年缘底事，者会丢去破蒲团。”两扇都由端方亲笔题写。给他人的物件大同小异。

不数日，第九镇仍乘轮船返回南京，太湖县秋操就此结束。

武昌起义前新军第九镇的动态

溥仪登基后次年春节，标房（即营房）颁布红谕，为宣统元年。当时，我和同学们虽说有点“革命思想”，其实是非常幼稚的。我们只希望国家能够强盛起来，满人不欺负汉人，列强不侵略我国，人民不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即使象日本的明治维新亦可。然而，事实并不如此。日益腐朽的清廷对外卑躬屈膝，甚至如中法战争镇南关大捷后，还向法国侵略者求和，签订丧权辱国的安南条约。对内则滥施淫威，把汉人当作敌人来对待。如我们这些人，遵旨到太湖县秋操，还向死掉的皇帝、皇太后举哀，真是再恭顺也没有了，然而清廷却将炮口对着我们。稍有一些民族自尊心的人谁甘愿当洋人和清廷的奴才。至此，我们逐步认识到中山先生的

“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的思想是正确的、必要的。我和同学们都有志把清朝皇帝赶出金銮殿。

陈玉谟事件，徐锡麟、熊成基事件，秋操事件，对我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宣统登基以后（就在一九〇九年这一年，我被派到将校研究所学习，回镇仍任队官），第九镇驻在南京的两年多时间里，民主革命的风潮此起彼伏，官兵深受其影响，思想认识普遍提高，特别是下级军官，革命情绪更为高涨，对清廷的离心倾向日益明显。在那些日子里，军事训练认真严格，人们确实意识到必有实战的一天。

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两江总督端方镇压革命运动更加雷厉风行，仅举查办赵声一案，便可见其一斑。赵声原是三十三标的标统。一九〇五年，他曾带了全标官兵去明孝陵凭吊，列队演说，宣传满人种种罪恶，并说明中山先生救国救民的宗旨，号召官兵团结一心，推翻清王朝。（那时我还没有到三十三标。我到三十三标后，赵声还是标统。平时接触，觉得他和善可亲，并能与部下同甘共苦，深受部下的爱戴。我与赵声相处不久，他便到广东去了。）此时端方竟然追查起五年前赵声在明孝陵演说的事，还说要追查同党。一时第九镇人人紧张，个个自危。统制徐绍桢更是紧张，他素知端方为人，若因此受到牵累，丢官事小，甚至身家性命亦无保障。端方为追查赵声案，特派亲信俞大鸿^①做三十三标标统，严加查问。其实，端方的用意是想借此来压制第九镇，特

^① 俞大鸿，字幼舫，常州人。与顾忠深原是要好的同事。俞为谋安徽混成旅旅长差事，在熊成基起义后，谰言端方，力劝杀死顾忠深未成。此次随端方来南京，谋到三十三标标统职事。辛亥革命后，俞又投入袁世凯怀抱，想谋取江西省省长职位，袁世凯派他为特使，到李烈钧那里去。后被李烈钧部下捕获，斩首于鄱阳湖口。

别是压制三十三标的革命情绪，其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不过，也制造了一番紧张气氛，换了三十三标标统，安插了几个亲信：

柏文蔚此时是三十三标第三营管带，因在俞大鸿属下受到很大压力，当下便离职而去。徐绍桢自经过太湖县秋操的教训，又遇到这一次端方追查赵声案，觉得清廷对他不信任，从此岌岌自危。

辛亥年(宣统三年)三月(即一九一一年四月)，中山先生领导的广州武装起义失败，收到遗骸的殉难者便有七十二位(葬于黄花岗)。消息传到南京，我和同学们无不死难英烈的精神所感动，对清王朝愤恨的心情难以笔墨抒写。经过几年酝酿的士兵也都跃跃欲试，大家都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跃马扬戈于沙场，把祸国殃民的清王朝马上推翻。

官兵响应武昌起义

当年八月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我们热切期待的一天终于来到，震撼世界的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南京：“武昌革命军起义，两湖总督瑞澂和第八镇统制张彪逃到军舰上去了，黎元洪为都督。”第九镇官兵都禁不住雀跃高呼：“响应武昌！”统制徐绍桢既无法制止部下的革命行动，又不能解除张勋对自己的怀疑和威胁。他知道只有响应起义才是出路，但又恐在南京城内与张勋的军队冲突，伤害百姓，失了民心；况且，第九镇的军力也不占优势，三十五标常驻在镇江，三十六标远在江阴，全镇首尾不能相顾，挤在城内又不易进取退守。徐绍桢便下令将全镇调到距南京城约一百里的秣陵关去。当时，从南京城内调去秣陵关的有三十三标、三十四标两个标的步兵，另有骑兵标，炮兵标，工兵一个营，辎

重一个营，卫生一个队，电讯一个队，军乐一个队，担架一个队和大小行李车等。第九镇还有许多旗人军官，此时叫他们暂时回家，照领薪饷，以免误事。

队伍一到秣陵关，第九镇就立即宣布“响应武昌起义”，同时熟悉地形，布置战局。炮兵、步兵进入阵地，骑兵将马刀开口，每日出哨三十余里，搜索间谍，侦察敌情，派出步兵斥候三十余里，安排值星小队，防止张勋军队的突然袭击等等。但是，最大的困难在于弹药匮乏，由于枪无枪弹，炮缺炮弹，一旦开战，势必难以攻守。就以我们三十三标为例：原存子弹五万发，都被全镇出名的清王朝忠实走狗王光照交进了子弹库，军队到了秣陵关，只有打靶余下的一些子弹，全标分发，每人仅得三、二颗。此时，回想前事，人人切齿痛恨王光照，大骂他是“汉奸”、“走狗”。一天，我们正扎好营帐，王光照骑着马贼头狗脑地四处张望，人们正值议论气愤之中，一个士兵大喊：“汉奸来了！”大家随声聚集，见是王光照，也都大叫：“打死汉奸！”王光照见状，鞭马狂奔，众人拿枪追赶不及，被其逃逸。

赴上海都督府领取子弹

柏文蔚自辞职他去后，一向不通消息。此次第九镇响应武昌起义，柏文蔚由上海同盟会派来参加。柏文蔚一到我们驻地，三十三标官兵热烈欢迎（原来柏文蔚和标内兵士相处很好）。当下，柏文蔚先见参谋长沈同午（字职公，常熟人），再与沈同午见统制徐绍楨，商议起义大举，所议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子弹问题。

最后决定，命我带领一百五十人，立即去上海都督府领取子弹。其时，我仍是队官，我便挑选了精壮机灵的兵士一百五十人，

布置了统制的命令。我和我所带领的人，全部脱去军装，改穿老百姓的衣服，我分发了各人乘车旅宿的钱，并约好在途中装作互不相识，各自行动，但不要掉队。

化装后，我们从秣陵关乘船到南京，准备由下关乘火车去上海。船至下关，我上岸去仪凤门，见城门紧闭。我走到城下，将城门推推，毫无动静，心中颇疑虑。踌躇间，城门边有一妇人对我诉说城中情形：“昨天晚上，革命党打雨花台，被打败了，现在已往镇江跑了，城里正在抓革命党……”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煞是难过，恨不能一步跨到上海，领来子弹将张勋打出南京。我忙赶到船上，招呼兵士们上岸，到尧化门买票上火车去上海。当火车路经镇江、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昆山各站时，见到月台上都挂有白旗，以此知道除南京外，沪宁沿线各城都已“光复”了。我的心中又喜又急，真是难以文字形容。

火车抵达上海时，已是下午。上海都督府早已接到电报，派了許多人来欢迎和照应我们，派来接待我们的有《民吁报》编辑范鸿仙（笔名孤鸿）、郑赞成，以及沪军都督府的赵念柏（赵声的兄弟）、林樵庵等多位。范、郑二位接待我们到宿舍吃夜饭，安排了士兵们的住宿，当夜便领我去见沪军都督陈英士，说好次日将子弹送到火车站。

谁知事出意外，我和士兵们在次日八点多钟吃好早饭后，到了火车站，却见装满子弹箱的马车都停在车站外面不准进站。（原来铁路是英国人所办，与清廷有借款关系，不许运送子弹。）我急忙找到《民吁报》报社于右任，由于右任设法与车站交涉。为稳妥起见，于右任又叫接待人员拿来狭幅白老布一百五十匹，叫士兵们各将子弹一千颗裹附身上，外面仍穿上便衣。这样共领到子弹十五万发，一百五十个人一同乘上火车，虽然士兵们负荷沉重，却喜一路顺利，毫无障碍，直抵镇江。

火车一到镇江，车站上早已站满了欢迎的队伍。我便带一百五十人整队，在车站上卸下了子弹。一问徐统制，回说这里是林都督的队伍，连问几个讯，才知徐统制住在城内一家旅社里。我便进城找到那家旅馆，但徐绍桢不在，只遇到一位陈参谋，我将领到子弹的事对他说了，陈参谋很高兴，他也介绍了近日战况及形势，说：“统制中了反间计，攻打雨花台失败。现三十五标、三十六标已独立，归林述庆指挥。三十三标、三十四标在败退时，由柏文蔚带走一营人。目前统制正在收集部队，估计步、骑、炮、辎各部能有一半归队。你来的正好……”说话间，徐绍桢回来了，陈参谋迎上前去，将我去沪运子弹安返镇江的事说了一遍，徐绍桢闻之欣喜。我上前行礼，徐拉着我的手说：“免礼免礼，你辛苦了。”我说：“请统制安。现在十五万发子弹尚在车站，请统制示下。”徐绍桢便命陈参谋与我一起到车站去，将子弹连人带归。徐又对我说：“第九镇此次响应武昌起义，统领、管带跑散者极多，将才难得，望贤弟多多帮忙。”言下之意，要提拔我做营、团长了。我只能说：“谢统制栽培。”原来，徐绍桢自冒险攻打雨花台失败后，部下不满，士卒离散，处境很是难堪，此时正在聚集旧部，准备运动前程。但不多日，同盟总会便决定成立江浙联军，顾忠深任总参谋长^①。此时，原来受熊成基起义牵连，被判充军口外的顾忠深已回到南方。前些时期，他在江苏都督程德全处任参谋长。

北渡长江 进攻浦口张勋军

江浙联军总部设在镇江。联军的组成有：沪军（都督陈英士）、

^① 江浙联军初成立时，未设总司令职，由总参谋长统率全军。

镇军(都督兼水军都督林述庆)、苏军(都督程德全)、浙军(司令朱瑞)、皖军(又称淮军)、扬军,加上原来第九镇三十三标、三十四标和骑、炮、辎、工整编军及湘粤军约一万人。

江浙联军组成后,推动了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适应革命新形势的发展,起到较为积极的作用。其中以同时攻克清廷盘踞的江苏重镇南京、浦口两地一例最为突出。

其时我在联军总参谋长顾忠深处。联军委李竟成^①为江北支队队长,委我为江北支队参谋长。顾告诉我一个绝密消息,说:“雪楼(即程德全)请我同袁世凯的密使廖宇春^②谈判。廖宇春保证我军进攻南京时,袁世凯决不出兵相助张勋。”原来,袁世凯逼清廷退位,清廷因汉阳有冯国璋一军,南京有张勋一军,以为很有实力,不肯就范。清廷曾向冯、张二人许愿,只要保得清廷无事,将来升部堂大臣,晋封男爵。故冯、张二人死保宣统,拚命卖力。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便派廖宇春来游说联军,希望联军将张勋打出南京。这对联军来说,由于解除了对北方的后顾之忧,确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顾忠深就叫我们作好准备,奋力攻打,力获全胜。

农历十月初,联军决定分兵两路,在江南、江北同时进攻南京、浦口两地。江南是主力,分向聚宝门、朝阳门、神策门、天堡城数路进军南京;江北则经由六合向浦口攻击,截断张勋军队的后路。全军在镇江西面的高资督师,次日便发动了全面进攻。

江北支队的组成,有原驻镇江的湘军约一千人(统领张镇发下有王营长等两个营),原第九镇六百人(由我的同学郭叔完和邓超

^① 李竟成,镇江人,曾任三十三标三营左队排长。李随赵声到广东,参加广州武装起义失败后,又随赵声同赴香港。武昌起义时回来,由沪军都督陈英士推荐,联军委以江北支队队长。攻克浦口后,便脱离革命不知去向。

^② 廖宇春,字少游,松江人,曾任清河陆军学校校长。

带领),扬军约一千人(由徐宝山部下董开基营长等带领),淮军一千人(其中有柏文蔚自沪带来的一营人参战,此一营人战斗力较强,装备有德式重机枪)以及瓜洲镇炮船二十余艘(由镇台赵鸿禧指挥,炮船担任警戒和助战)。

江北支队北渡长江后,按原计划全队先到扬州集中,整训数日。然后由我同李竞成、徐宝山等率部乘赵鸿禧的炮船沿河南下,入长江折西,再沿滁河北进,炮船驶至六合傍岸。此时,官兵斗志旺盛,又且熟悉地形,船一到岸,列队后一声令下,便都占据有利地形,布置战局。

浦口胜利光复

农历十月十日,龙王庙山上,炮兵已将阵地布置完毕,步兵也在前线筑好工事,李竞成在前线看了一转,命我负责指挥,自己带一连人去后方接应。晚上八点多钟,我和徐、张等人议决,即时下达进攻命令。谁知到晚上十点多钟,支队老湘军张镇发的部下王营长不肯向前推进,张镇发大怒,说王营长违抗命令,要杀他示众,王营长不甘示弱,声言准备火并,并说不愿与张勋打仗。我亦深恨王营长,但此时正在紧急关头,若不早为平息,势将不可收拾,只得暂时忍耐,劝张镇发随我前行,命王营长及所部固守一边。

夜间十一点钟,支队发布命令。先由炮兵开始向敌方阵地袭击,但因炮的口径太小(只有37.5毫米),射程太短,炮弹达不到敌军阵地,不能对敌方产生大的威胁。敌方阵地的炮兵也开始还击,敌炮是75毫米口径的山炮,射程比我军的炮远一倍以上,炮弹在我阵地前后落下。所幸敌方炮兵并不会用炮,都未将引线拉出来

使炮弹爆炸。所以我军并不害怕，决定将炮位移近敌阵。但刚一行动，即被敌军察觉。敌军用机枪封锁射击，弹如急雨，我炮兵不得不暂停推进。为保证我军顺利推进，我军柏文蔚部以四挺德式马克沁重机枪向敌军轮番猛烈射击，压倒了敌方的火力。

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忽然下起雨来，雨越下越大。我军没有雨具，战斗受到很大影响。为保证战斗的顺利进行，支队指挥部紧急磋商，急传口令：“停战避雨。”敌方也随之停火。此时，整个战场又恢复了寂静。

十一日凌晨四点多钟，我借着晨光视察阵地，见到我军士兵牺牲一人，受伤三人。我慰问了伤兵，并以支队的名义对在场官兵发表简短讲话，要士兵们好好休息，设法烘干淋湿的衣服，鼓足勇气，准备进行更猛烈的战斗，为胜利光复浦口作出牺牲。

上午九点多钟，奉江南总部电令：“今日下午一点整，江南攻南京，江北攻浦口同时进行。”我军在十一点钟前做好了各种准备。下午一点整，冲锋号声激昂，在工事里待命的官兵此时斗志正旺，都猛向敌方阵地冲杀前进，但敌方火力十分猛烈，冲锋受阻。此时，敌方阵地已在我炮火射程之内。为有效遏止敌方火力对我军冲锋的威胁，我带着两个护兵匍匐至张镇发炮队阵地指挥，由于没有防震设施，连续轰响声浪将我的耳朵震聋。下午三、四点钟，徐宝山部营长董开基率队冲锋，与敌军奋力拚杀，当场阵亡（士兵阵亡者二人，受伤者五人）。董部因无人指挥，只得向后撤退，徐宝山急令抢回董开基等三人尸体，在董开基身上寻得一只金壳打璜表，留作纪念。命董开基的儿子董万青将其父及阵亡兵士遗体送回扬州安葬，受伤的士兵也带回扬州医治。营长方永昌（崇明人）也在此次战斗中阵亡。

到晚间十点钟，我方再度发起进攻，我指挥张镇发部步兵冲

锋，敌方机枪射击，左右倒下多人，我急命“卧倒”，并叫护兵传言炮兵打炮，消灭敌军的机枪射击点。谁知，跟我的两个护兵都被敌机枪击中阵亡（这两个护兵都很年轻，都是我在三十三标做队官时跟我的兵士，其中一个叫李松亭，南京人氏，阵死时年仅十九岁）。这时，后续部队上来，也带有机枪两挺。于是，我方也用机枪射击，掩护冲锋。

战斗越战越烈，距离越来越近。当我军到达敌阵前面百余米处，敌阵枪声顿息，时已是深夜十一点钟，天黑不见五指，加上道路坎坷不平，我军疑敌有诈，暂停冲击。派斥候侦查后，才知敌阵已空无一人，张勋的军队已悄悄逃走了。

十二日拂晓，苏北重镇浦口顺利光复。事后得知，由于支队截断了张勋军队的退路，南京光复时，张军如惊弓之鸟，只得在距浦口上游百里左右的地方渡江逃命。我军进抵浦口时，在浦口车站截得一批准备逃走的火车，车上是张勋爱妾小毛子（被柏文蔚部俘虏）。另缴获大皮箱八只，银子两箱，归徐宝山部所管^①。

进入浦口，搜查张勋残部及散兵游勇刚毕，确知南京亦在同日光复。

迎接中山先生到达南京

十四日，联军总参谋长顾忠深派人带来电报文稿，准备发电

^① 笔者在场亲见这个箱子，并将其中两个箱子打开看过，每个箱子装方宝（不是元宝）一百只（每只五十两），共银一万两，其余八只皮箱未曾打开。由于战争尚未结束，便交给瓜洲镇台赵鸿禧，由他派炮船护送扬州。谁知到了扬州，二个木箱并无损失，八个皮箱打开，尽是砖头、纸片，徐宝山大怒，因赵鸿禧是徐的徒弟，触犯了帮规，“欺世灭祖”，要将赵鸿禧杀死，由于众人力劝是罢。徐恨恨对赵说：“你今后休来见我！”

上海转国外迎请中山先生到南京成立民主共和政府，我签了名。农历十一月初，联军总司令部又来电通知，说中山先生已到上海，各省代表正在南京开会选举总统，中山先生即将来宁，通知要我们到时候派代表去迎接。农历十一月十日，又得到司令部紧急通知，说中山先生即日赴宁，速派代表去南京迎接。支队议定派我为代表前往迎接。

十一月十一日过江后，我没有见到顾忠深，只见到徐绍楨。徐告知，中山先生大概在次日能够到达，我便住到我岳父李寿山（清海军炮船管带）家去待命。十二日一早，我又去徐绍楨处，徐绍楨对我说：“徐宝山来电，他要回扬州，请你立即回去。”我很清楚，自支队攻克浦口，李竟成借故离职后，一直没有回来；柏文蔚独树一帜，不大受支队指挥；张镇发的部下又都不听张镇发的节制，所以徐宝山会突然决定回到他的老基地扬州去。我急着要回去，但想到既然我代表支队迎接中山先生，为何不见一面就回去？于是我决定，接到中山先生后，立即北返。当下，吃过早饭，我便跟着徐绍楨一起到下关车站。在下关车站欢迎中山先生来宁的人有二百位左右，其中有十几个是外国人，我们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先生乘坐的火车才进站。

火车停靠后，车厢里先有数十个全新戎装的卫士下车，站立两边。接着中山先生缓步下车，举目环视。我此时心情十分激动，跟着欢迎的人群一起上前细看，中山先生身穿獭绒领大衣，慈容含笑，和我们一一握手致意。中山先生每同一人握手，必看一方对方的脸面。当中山先生和我握手、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看着我时，我红着面孔报了自己的姓名。

中山先生和大家握手毕，发表了简短讲话，我因耳朵不便，没听清楚。只见大家都跟着中山先生上火车，我也跟了上去。火车

开到督署下车，大家又都跟着中山先生进入两江总督府（这里已是总统府了）。中山先生和大家说话，片刻，因先生还要商量就职要事，我和许多人都辞了出来。

孙中山任命我为第二军参谋长

次日（农历十三日）我便返回浦口。十五日，我们都知道了大总统任命各部人选的结果：黄兴任陆军部长兼参谋部部长，钮永建任参谋部次长，徐绍楨任南京卫戍司令。并知道已任命柏文蔚为安徽省都督兼北伐第一军军长，徐宝山任北伐第二军军长，任命我为北伐第二军参谋长。不日，在扬州，我接到大总统孙文和黄兴亲笔签名的任命状。

第二军奉命驻扎扬州，军部设在前盐运司衙门，我住在里面。

第二军成立后，我便首先同徐宝山商量军饷问题。徐宝山说：“我有两淮的盐，军饷没有问题。”第二，兵员和军械问题。徐宝山将他贩私盐的一些帮会兄弟和清朝老营中无处藏身者，杂凑成四个旅。旅长有张仁奎、杨瑞文、米占元、方更生，团长有马玉仁、顾翰屏、张国威等人。命米占元旅驻守清江（淮阴），以防张勋。

民国虽已创立，但北京宣统尚在。壬子年春节之前，就听说清帝即将退位，临时政府正在同袁世凯进行的南北和议即将完成。本来，中山先生竭力反对和议，认为象袁世凯这样的人，全无民主共和的气味，如果让他独揽大权，不啻葬送多年苦心经营的革命事业。因此中山先生竭力主张值此革命情绪高涨之时，不如一鼓作气，乘势北进，直取北京，一劳永逸。先生殚思极虑，多方筹措成立北伐一、二军，其意正在于此。

但是，一则革命党内部在和议问题上意见分歧，二则新成立

的南京临时政府中各成员派别复杂，许多军政要员原是清政府中的旧官吏、旧军官(我自己就是在旧军队中参加起义的)，只是随着革命的潮流，裹卷而来，根本不了解中山先生的宗旨，更何谈“革命”二字。于是和议的意见占了上风。

而在和议进行中，袁世凯要尽阴谋，反复无常，忽而宣称要“君主立宪”，忽而又说“即请清帝逊位”。壬子年春节后，我知道宣统已经下诏退位，当时还感到很高兴，以为宣统皇帝毕竟被革命赶跑了。谁知宣统退位却是以中山先生的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作为交换条件的。我虽然身为军参谋长，对此却甚糊涂，直到事情证实，方始明白。中山先生提出辞职书，推荐袁世凯为大总统，但坚持定都南京。袁世凯竟顽固地不肯南下就职。为了寻找借口，袁世凯又玩弄阴谋，暗中鼓动假兵变，唆使兵士抢劫北京大栅栏珠宝廊等处，却将“乱兵”两名正法示众。托言必须亲自坐镇北京，弹压兵变，不克南来。事情无独有偶，驻南京的江西老军，也发生兵变。在南京城内鼓楼下北门抢劫、放火。黄兴下令枪毙乱兵^①。江西驻军统领刘×政逃往北京投袁世凯去了。当时，谣言四起，有的说兵变是真，有的说兵变是假。

鉴于此时形势，我对革命前途深为关切，为此特往南京见钮永建(此时钮是我的直属上司)，他带我同往总统府拜见中山先生，并同中山先生进行了谈话。当我们称赞先生领导的革命使中国面貌

^① 江西老军驻南京，因二个多月未曾发饷，发生兵变，抢劫并火烧城内鼓楼下北门桥几家小店小户。南京商会会长苏南屏、副会长仇继恒当即去见陆军部长黄兴，黄兴亲自将二人迎接进去，打躬赔礼。苏仇二人大声责问：“我们欢迎革命军来，希望救国救民，为何抢劫放火，危害商民？”黄兴说：“兄弟治军不严，罪在兄弟治军，一切由兄弟负责。”黄兴便叫商会将所有受损店开具失单，全部照赔损失，用公债抵付，一面追捕乱兵，前后一共捉到乱兵一百多人，全部押往小营枪决。

大为改观时，先生仅淡淡一笑，马上以严肃并带有激愤的神情说：“这样的革命不彻底，留袁氏在北京，终究是祸根。”我请问先生今后如何革命，先生说：“南京总统府留守除我而外，一切如旧。惕生先生（即钮永建）也不走，你们一切照旧。”辞别先生后的第二天，我仍回扬州。不日，我确悉先生已离开南京。先生从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宣誓就职，到三月底离开南京，只做了三个月的临时大总统。

到北京参加军界统一会

袁世凯窃踞大总统之职后，南北名为统一，北京成立了全国军界统一会，由段祺瑞任会长，章适骏^①任副会长。全国军界统一会通电全国各省军队派代表到北京开会。接电后，徐宝山要我代表第二军出席会议。我问：我的职务由谁代理？徐宝山答称由上海报馆当主笔的袁康侯代理，并说此人学问很好。我说：袁先生若无军事知识，是不能代理的。徐宝山说：代理不会太久，等你开会回来，便仍交卸。我知道对徐宝山这个人是没有道理可说的，只能将参谋长职务暂交袁康侯。但我当时还兼任该军第十一师师长之职，无人代理。徐宝山的军队全无教育，我先此已去广西请同学冷遁来扬州帮助，冷遁还没有来，时间已来不及。此时章梓^②从日本回来，同学郭叔完^③力言章梓能干，章梓在我面前也说，他在外面已有相当军械，到时可供第二军利用。我便在徐宝山面前力保章梓为第十一师师长，照管一切。

① 章适骏，字继读，湖南人，日本留学生。因骑马跌断一腿。

② 章梓，字木良，日本留学生。

③ 郭叔完，字佛度，江苏浦口人，曾任第二军的团长。

我到北京军界统一会报到，外省代表先期到达者不少。由于晚去，统一会众代表还开欢迎会欢迎了我。我也去各代表住处问候致谢。今日能记起的代表有：直隶靳云鹏、徐树铮，山西孔庚，湖北赵均腾、王占元、孙传芳，江西黄九言，浙江屈映光、卢香亭、张栩，山东吴长植（后任山东混成旅旅长），广东张文、张香池，安徽吴介麟等等。会议记录唐在章。我们都住在北京煤渣胡同贵胄学堂。会议正式开始后，江苏都督程德全的代表张一麐才到。

会议期间，会长段祺瑞将黎元洪来电稿给大家看后（内容是要求统一会决议将火烧汉阳的三个罪魁送往湖北惩办），即将此事交统一会协商。许多代表说：“两军交战，只求胜敌，遑论其它。”亦有代表说：“国内战争，不应下此毒手，祸首必须严惩。”还有代表说：“国内战争早就结束，不应再提战争事。”议决：电请黎元洪对此免于追究。会议又讨论了全国统一，亟需裁兵的方案。其实，军界统一会又是袁世凯玩弄的一种手段而已。

我在京开军界统一会会议期间，段祺瑞的副官韩次军^①告诉我说：因张振武、方维是反对黎元洪倒向袁世凯最烈的两个部下，黎元洪借机派此二人去北京开会（不是军界统一会议）。一面又密电袁世凯将此二人借故处死（由袁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人称“陆屠户”的监斩）。此事被两院议员得知，即大呼大闹，一定要政府接受议员质询，袁世凯即派段祺瑞出席（韩次军陪同亲见），段祺瑞用强硬的口气说道：“张、方二人违反国法，国家有权处以极刑。”说罢即退出会场，议员无可奈何。从此议会形同虚设。

会议结束时，全国军界统一会的全体代表合影留念，合影由日本人开设的同生照相馆承摄，后每个代表都取到二十四寸照片

^① 韩次军，字宾礼，保定军校毕业，曾是柏文蔚的副官。

一张(我拿到的照片在抗战时遗失)。

我在北京开会期间,那个第二军的代参谋长袁康侯出了事。原来,袁康侯自代理第二军参谋长后,终日花天酒地,一个多月亏空银元二千。徐宝山大怒,要将袁康侯钉镣收监,亏得上校参谋侯中柱^①竭力求情,徐宝山方准袁康侯离职他去。因为参谋长无人代理,有关军情的公文堆积如山,急待处理,我在北京连接急电,徐宝山催我尽早回去。待统一会议闭幕,我急忙辞别了段、章两会长,回到扬州。

再次拜见中山先生

到扬州后,知道章梓与徐宝山意见不合,已与郭叔完等到了南京。章梓任南京第一师师长,我原来电请到扬州帮助的陈通知徐宝山处情况复杂,便也在南京任了第三师师长。他们来电劝我从速离开扬州。其时,我又发现徐宝山与张勋勾结。原来,张勋知道徐宝山是青红帮中人物,就利用帮会关系,派傅心田作牵合人。徐宝山在帮中是“伍”字辈,傅心田在帮中是“大”字辈,傅心田与徐宝山的部下张仁奎是平辈。我见傅心田与徐宝山的部下军官往来甚密,便也在某些下级军官中探索,探知徐宝山确与张勋勾结,企图借机叛卖革命,我便当面力劝徐宝山不要与张勋往来,并以大势和正理说明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走的是正道,张勋之流顽固不化是必定失败的,劝徐宝山不要上张勋的当。徐宝山反过来要我不必固执,并且一再劝我进他的帮会。(在此以前,我到扬州不

^① 侯中柱,字之生,江苏无锡人,与笔者为同学。笔者在第二军任职时,委侯为上校参谋。侯爱读书,为人厚道,终生未曾娶妻,抗战时逝世于南京。

久，徐宝山就一直诱我入他的帮会，我总是说：“我们还是一起跟随中山先生革命吧。”）此时，我知劝阻已无效果，便借故赶到南京，会见了章梓、冷遁等人，又赶赴上海，将在北京军界统一会开会的情况并北方正在大举添兵、南方无论如何不能裁兵的建议报告了钮永建，我又同钮永建一同去见中山先生，将上述建议以及徐宝山勾结张勋的情形，详详细细地报告了中山先生，并说明了自己独力难当。中山先生说：“你且回去，稍休待命。”我便打电报给徐宝山，辞去参谋长等一切职务，措词很客气。我辞去参谋长等职后，知段芝贵荐徐镇淮继我为徐宝山处的军参谋长。

留守总统府北迁 孙中山提名我为补官少将

随后，我回到南京。章梓、冷遁一见到我，就说：“你好运气，总算没有遭到毒手。”我问情由，章梓叫我问郭叔完。郭叔完说：“我的连长、排长来了好几个。他们都受不了那里帮会的滋味。他们告诉我，傅心田引来一批徒子徒孙，天天在运司署衙门附近打转，要刺死参谋长。”我说：“那不一定吧！”郭叔完说：“×排长和张仁奎手下的一个排长是邻居，他们的女人很要好，×排长和那个排长常常在一起喝酒。学长^①走的那天，他们在那个排长家喝酒。那个排长尽问参谋长的事。×排长有意追问，那个排长又不肯说出，后来×排长有意激他，又赌咒保证，那个排长才说傅心田要刺死参谋长。×排长故意不信，那个排长把傅心田徒子徒孙是哪几个、什么辈份、怎样出入傅心田家的情况都说出来了。”我听了这些，也笑自己劝徐宝山走正路的幼稚。郭叔完又拍着桌子说：“那时我

^① 郭叔完与笔者同学，称“学长”。

和邓超还竭力保释这个贼子^①，几乎害了学长性命。”

袁世凯做了大总统后，不得已，根据“临时约法”提名，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委中山先生为铁路总办。

留守总统府北迁后，钮永建迟迟方到北京，我跟钮永建同去。袁世凯给钮永建五万元（银元），要钮永建去内蒙古调查，目的是不要钮永建做参谋部次长（即不参加其内阁）。钮氏真的去了内蒙。我那时由段祺瑞委为陆军部少将参议。我辞去第二军参谋长后，中山先生即提名我为补官少将（与我同补少将衔的，还有做过第九镇参谋长的陈英士的哥哥陈霭士），因此未曾随钮氏同去内蒙古。

（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

^① 第九镇进攻雨花台失败至江浙联军进攻南京、浦口一段时间，敌我内部都非常混乱。当时镇江都督林述庆部下的宪兵捉到一个名叫傅心田的间谍，解往都督府受审。第九镇的队官邓超、郭叔完等来邀笔者同往林都督处去保放，当时傅就被释放了。后来才知道此人确是张勋的间谍，几乎害了笔者的性命。